

watch | 上证观察家

最重要的是重塑投资者信心

中国资本市场之所以能够取得发展,广大投资者对国家改革开放所抱有的信心,对市场发展所抱有的信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把坚定不移地发展资本市场的态度向市场宣示清楚,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向投资者宣示清楚,将使投资者从短期的行情起伏中摆脱出来,树立起看好市场长期发展的坚定信心。

◎ 元明清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幅震荡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话题。对于引起这轮下跌的成因,坊间的各种分析应该说都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在集中推出一系列取向高度集中于压缩市场流动性的政策措施后,市场面临一定的压力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过度的下跌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超出市场的承受能力,如果处理不当,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最近一个阶段,我们注意到,有关部门的官员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多次公开表态,表示某些政策措施的推出并不是针对股市。

大量个股的巨幅下跌,使市场形成了在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结构性熊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由于一些在指数中占到了过多权重的超级大盘股的作用,这一事实在相当程度上被掩

盖了。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目前正面临一个重要任务,在防止过快上涨引发普遍性投机风潮的同时,还应该避免过度的下跌,就最近阶段来说,防止过度下跌比防止过度上涨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

众所周知,推动一个市场走向牛市,一靠资金,二靠信心。没有资金,市场无法推高,但如果投资者没有对市场发展的足够信心,即使有了资金,也会在场外观望。前一时期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在收缩过剩流动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过多拥挤在资本市场上的游资开始正本清源,由这些场外资金催生出来的泡沫也得到了有效的挤压,特别是一些违规资金的离场有利于金融秩序的稳定。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在市场资金面开始收拢的同时,市场信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挫伤,最近一个时期市场成交量大幅度降低,就充分反映了这个现实。

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将近 20 年

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市场之所以能够取得发展,广大投资者对国家改革开放所抱有的信心,对市场发展所抱有的信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正是依靠着这种信心,广大投资者才能够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投资,也才能够从容面对新兴市场所出现的各种磨难与风险。《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颁布三年以来,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两年以来,广大投资者又一次从中看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坚定了通过股市投资来分享国民经济增长成果的信心。因此,投资者信心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倍加爱护。

广大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所抱有的信心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国家发展前景的信心上。经过将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基本国力大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升。5 年前召开的党的

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资本市场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征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将反映到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理应为投资者分享这种成果的一条有效途径。不管我们怎样看待目前的市场,但对此应该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显然,如果投资者在这一点上丧失信心,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离开市场,那么,这不仅是市场本身的问题,也将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因此,对于目前的市场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塑投资者信心,要让投资者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很显然,这是比增加市场资金存量更为重要的工作。我们经常看到,当市场出现急剧下跌的时候,舆论就会出现希望政府资金托市的呼吁,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有利于行情的上

升,但却会使政府受到市场的“绑架”。政府通过自己主管的机构进入市场托市,还会产生一个与投资者公平博弈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违市场公正原则,并不利于培育成熟市场。而如果能把坚定不移地发展资本市场的态度向市场宣示清楚,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向投资者宣示清楚,将使投资者从短期的行情起伏中摆脱出来,树立起看好市场长期发展的坚定信心;也将在根本上改变目前部分投资者所产生的恐惧心态与怀疑心理,有利于市场和谐。前一时期,管理部门部署了声势浩大的投资者教育活动,应该将其作为一项经常性活动持续下去,但这种教育活动的内容有待丰富,除了要把股市投资的风险讲透以外,让投资者树立起信心,看到希望,也应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市场行情不可能只跌不跌,也不可能只跌不涨,但投资者应该从这种涨跌中看出市场的风向,管理者更应该从这种涨跌中看到投资者的信心。只要我们从爱护市场、爱护投资者的目的出发,我们可以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这一轮大幅震荡的洗礼以后,一定能够克服前行道路上的困难,成功地开辟出新的天地。

“中国制造”危机源于职能部门不作为

◎ 王杰

7月12日,商务部发言人王新培表示,个别出口产品存在的问题不应波及中国全部出口产品。同日,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林伟也表示,中国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率可达九成九以上。

中国有句老话:一块臭肉坏满锅汤。中国制造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局。由于物美价廉,中国产品在国际上颇受欢迎,但是,也有个别产品屡屡出现问题。今年以来,从水产养殖产品到牙膏,从沙滩车到汽车轮胎,从玩具到手机,从食品到药品……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引发“信任危机”,最近尤以二甘醇牙膏事件炒最为火热。

今年5月,巴拿马查出国内出口的牙膏含有二甘醇开始,随后,内地牙膏产品相继在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遭遇安全质疑,不少产品甚至被停售,初步估计损失在1000万美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牙膏近年来在中国的诸多产品中一直是“绯闻”主角,先是“三氯生致癌”,接着是“含氟有害”,再接下来是“牙防组”违规认证被“端掉”,近日又爆出“含二甘醇”,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么多事情集中出现在牙膏问题上,难道是一种巧合?答案是否定的。牙膏风波不断,与我国牙膏安全标准、认证标准的缺失有关。截至目前,有关部门竟然还没有拿出规范企业产品质量的标准,企业“无法可依”导致问题连连出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迫使我国企业注意这些问题的竟是外国标准。7月11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出了《关于禁止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的公告》,其中提到:“出口牙膏因其他原料带入而致牙膏产品中含有二甘醇的,其含量必须符合进口国家或地区的要求。”

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先后禁止含二甘醇成分牙膏销售后,我国绝大部分牙膏企业相继停止在生产中使用二甘醇作为原料。但由于国内标准缺失,能否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企业的自觉。倘若有关部门之前就弥补这个空白,牙膏事件何至于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由于有关部门不作为,我们的企业不得不自己去查找“进口国家或地区的要求”,并按照其要求进行生产,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倘若我们的有关部门参照国外标准出台与国际接轨并且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我国企业据此生产的牙膏产品就容易合乎规范,牙膏产品也不会三天两头出现各种问题了。

在“中国制造”日益紧密地与全世界的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作为、积极作为,以严格而细致的标准确保我国产品质量经得起考验。否则,信任危机就如影随形,有关部门自然也难辞其咎。

税收增长应与民生投入保持同步

◎ 予人

在国税总局7月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税总局统计司长舒启明介绍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249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5615亿元,增长29%。伴随着税收收入的节节高攀,不久前有人预测,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将超过5万亿大关。对此,国税总局统计司长舒启明表示:“5万亿这个数字可能是根据上半年收入情况做的简单判断。”他说,全年税收最终如何,还要看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呈两位数数字高速增长,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加速特点。“十五”期间,全国税收年收入2001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分别突破15000亿元、20000亿元、25000亿元和30000亿元大关。5年共入库税款109217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未扣除出口退税),年均增长19.5%,5年翻了一番多。税收增收额2001年、2003年分别超过2500亿元、3400亿元,2004年和2005年连续超过5000亿元。2006年增收额已达6770亿元,而今年上半年增收额就已达5615亿元,超过去年是必然的。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我国税收的基本特征,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但是,我国税收增长与民生投入之间并未能完全保持同步。《中国青年报》日前作了一项调查:“作为纳税人,你最关心什么问题?”结果,

■ 雅玲随笔

银行业三方面缺失影响改革效率

◎ 谭雅玲

随着我国银行改革进程的加快,我国上市银行的业绩从2006年开始持续上升。工商银行日前发布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将超过50%;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也分别披露信息,预计净利润将同比增长100%和160%以上。这让投资者很感欣慰,从这几天银行股较强的上涨势头来看,上市银行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中流砥柱。

但是,我国银行业仍面临着诸多矛盾,更值得关注与反思。综合而言,我国的银行业改革存在着一定的缺失,有三个方面的情况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我国的银行改革模式过于倾斜外部,而忽略内部自身优势的整合。我国大型国有银行改革过于注重借鉴外部发达国家的模式,但我们的机制、体制乃至效率,就是市场发达程度很难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从内部看,我们已经有的



漫画 刘道伟

49.4%的人选择了“政府把我们缴的税用到哪儿去了”。这一方面反映出公众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民生投入与税收增长曲线的脱节和税收最终用途的不透明,让民众心中没底。

在我国,税收是比较透明的,而财政预算则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使得预算本身的法律特点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因而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有限。这必然导致浪费现象的蔓延。最明显的例子是,不少地方政府豪华办公楼的兴起和公款出国旅游、吃喝、公车等费用的直线上升。

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现在每年用于类似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极低,在各个国家当中倒数第一;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过高比例却是世界第一。现在,中国一种常见的、形成明线的现象是,每逢涉及基本民生问题时,资金的筹措难乎其难,但是一旦要搞大型豪华型建设时,资金就像呼风唤雨一般汇聚起来。”

政府消耗与民生投入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的浪费必然挤压民生空间。但是,这一现象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税务部门掌握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左右。但是,这一数据显然不足以反映民众的真实负担。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举例说:“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

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50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8000亿元的社保金等,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倘若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民众的真实负担就容易掩盖,就难以正视民生问题的严峻性。

事实上,最近几年,民生问题正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民生领域的投入滞后于税收的高速增长,导致公众在纳税之后,继续承担一些原本应由财政来解决的负担。比如教育,在义务教育领域,家长们深受乱收费之苦;在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领域,家长们又面临着高学费的困扰。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把增加财政收入作为终极目的,他们在增加税收收入的同时,对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做出某些让步,进而伤及民生。房价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地方政府打着调控的旗帜增税,这些税收随后被开发商转嫁到房价当中,而地方政府听任开发商哄抬房价的行为置之不理,从而使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加剧,压抑人们消费的欲望。

税收的增长不是最终目的,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才是最终目的,征税本身只是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手段,倘若把手段当成目的而忽略后者,税收的增长与公共福利的增长就容易脱节。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国强是民富的结果,在税收高速增长的同时,期待加大民生投入,使民众享受财政增长的好处而不是相反,如此,民众的纳税积极性更高,社会也才会更加和谐。

7月12日发布的当前全国洪涝灾情显示:截至7月10日,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4284.7千公顷,成灾2025.9千公顷,受灾人口6632.7万人,因灾死亡360人,倒塌房屋21.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43亿元。

每过几年,我们几乎都要为洪灾所带来的损失痛心疾首,尤以1998年洪灾和今年的洪灾为甚。洪灾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性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据统计,长江流域的原始植被已丧失了85%,上游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10%左右,吸纳雨水的功能削弱大半。

1998年洪灾之后,我国开始重视对相关流域植被的保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明显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流域内居民的经济生活来源无法保障。砍伐林木是长江上游林区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如果不能改变他们的这种收入结构,就无法有效阻止他们砍伐林木。另外,造林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也是一大原因。目前,采伐森林面积是同期造林面积的几倍,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市场化的逐利因素导致的,另一方面是有些地方在造林方面不作为导致的。

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同样与当地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植被以草地为主,当地农民放牧或者开荒耕地,造成草地面积急剧缩减。比如,青海省曾在1958至1960年在黄河上游开垦了570万亩草地,造成农牧两败俱伤,草地开垦后加速了表土的风蚀和水蚀,虽然已退耕还林,但至今未能恢复原来天然草地植被的原貌。

草地对于黄河的作用如同森林对于长江的作用。针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的研究表明,农田比草地的水土流失量高达40至100倍,种草的坡地与不种草的坡地相比,地表冲刷量减少77%。天然草地不仅能截留降水的水量,而且比开垦地有较高的渗透率,对涵养土壤中的水分有积极作用。一旦草地破坏,吸水、护水的屏障不复存在,水土流失就会加剧。

从根源上来看,无论是长江中上游对森林的无节制采伐,还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对草地的破坏,都与对利益的角逐密切相关,在当地居民获取小利的同时,由此带来的环境恶化给整个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鉴于这种现状,应该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加大对长江、黄河等流域中上游地区居民的财政补贴力度;对部分地区居民进行迁移;由国家组织培训,彻底改变当地居民通过破坏环境获取生活来源的状况;把植树造林、环境保护等指标列入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促使官员真正关心环境,保护环境,以阻止环境的恶化趋势,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

voice | 上证名记者

“名家”的危言警市与自相矛盾

◎ 倪小林

总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惊世骇俗的结论,经济圈内谢国忠先生算是其中之一。近日股市的波动已经引起人们很多的议论,谢国忠先生此时又一次对股市发出预言——“中国股市崩溃已经发生”。笔者非常希望这不是谢国忠先生所言,因为诸如“崩溃”和“推倒重来”之类的评价,是对一个事物确定性的结论,如果这些结论与事物发展差距过大,弄不好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笔者仔细看了美国一家杂志对谢国忠先生采访的文章,谢国忠先生在文章里对于中国股市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他他对股市所作的以上结论。不过,如果耐心读完谢国忠先生的这篇文章,不难从中发现里边的观点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其一,谢国忠先生所言的一些事实,与他所定性股市崩溃已经发生很大的差距,“崩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定义的:完全破坏和垮台。显然我国股市虽然存在问题,有很多需要改革之处,但是显然没有到这样的地步,说“崩溃已经发生”未免言过其实。其二,在文章中谢国忠先生自己也做了这样的判断,“由于心理变化,市场的调整可能会经历较长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最终的失败,因为市场上的资金仍然很多,整个系统的流动性仍是巨大的。”一个被人定为已经“崩溃”的市场,难道还没有失败吗?如果谢国忠先生只是为了获取眼球,引起关注做出如此结论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谢国忠先生以往的身份以及他在投资界尚有的影响,出言如此之重实在不太合适。

我们回头看看中国股市是不是真如那些预言者所得的结论呢?

第一,从客观环境看,中国股市是一个年轻的新兴市场,它的特征特征虽然反映在市场上会有很多人不尽人之处,但是它所面临的全球金融化的机会和挑战,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我们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和力度,机会是很多的。

第二,从中国经济的内生状态来看,也不至于如此。目前中国的公司资源非常丰富,除了目前蓝筹股不断进入市场,还有很多的好企业还没有进入资本市场。其中还有很多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正酝酿和打算在中国股市上市,这些都是提升中国股市质量的重要资源。再者,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于股市的需要是有目共睹的。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正在积极推进,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正在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工具,对于满足广大投资对象的不同需求,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有极大的好处。而且,今年以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

另外,微观市场治理也正在走向正常化、经常化。股权分置改革这个中国股市最大的市场难题解决以后,证监会对于市场的动态监管已经在提升投资人长期看好股市的信心。最近股指波动虽然很大,但是基金的购买并没有冷下来,即使股市有波动,真正离场者还是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发展过程的股市特征也极为明显。作为熟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人士来说,对一个发展中的市场进行定量分析和挫折,也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此,用那些具有结论性的定性语言为一个新兴市场上已经“崩溃”的结论,是不是有些过于武断,危言耸听?

治理灾害须从经济角度入手

◎ 叶蔚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7月12日发布的当前全国洪涝灾情显示:截至7月10日,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4284.7千公顷,成灾2025.9千公顷,受灾人口6632.7万人,因灾死亡360人,倒塌房屋21.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43亿元。

每过几年,我们几乎都要为洪灾所带来的损失痛心疾首,尤以1998年洪灾和今年的洪灾为甚。洪灾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性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据统计,长江流域的原始植被已丧失了85%,上游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10%左右,吸纳雨水的功能削弱大半。

1998年洪灾之后,我国开始重视对相关流域植被的保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明显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流域内居民的经济生活来源无法保障。砍伐林木是长江上游林区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如果不能改变他们的这种收入结构,就无法有效阻止他们砍伐林木。另外,造林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也是一大原因。目前,采伐森林面积是同期造林面积的几倍,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市场化的逐利因素导致的,另一方面是有些地方在造林方面不作为导致的。

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同样与当地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植被以草地为主,当地农民放牧或者开荒耕地,造成草地面积急剧缩减。比如,青海省曾在1958至1960年在黄河上游开垦了570万亩草地,造成农牧两败俱伤,草地开垦后加速了表土的风蚀和水蚀,虽然已退耕还林,但至今未能恢复原来天然草地植被的原貌。

草地对于黄河的作用如同森林对于长江的作用。针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的研究表明,农田比草地的水土流失量高达40至100倍,种草的坡地与不种草的坡地相比,地表冲刷量减少77%。天然草地不仅能截留降水的水量,而且比开垦地有较高的渗透率,对涵养土壤中的水分有积极作用。一旦草地破坏,吸水、护水的屏障不复存在,水土流失就会加剧。

从根源上来看,无论是长江中上游对森林的无节制采伐,还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对草地的破坏,都与对利益的角逐密切相关,在当地居民获取小利的同时,由此带来的环境恶化给整个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鉴于这种现状,应该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加大对长江、黄河等流域中上游地区居民的财政补贴力度;对部分地区居民进行迁移;由国家组织培训,彻底改变当地居民通过破坏环境获取生活来源的状况;把植树造林、环境保护等指标列入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促使官员真正关心环境,保护环境,以阻止环境的恶化趋势,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